

沙卡洛夫與蘇聯人權運動

喬一名

俄羅斯人陰沉的民族性是著名的，另一方面，他們有時也異常勇敢，不怕犧牲。憑着這種條件，他們曾經擊敗了拿破崙與希特勒的入侵，同時也推翻了沙皇的統治。但五十多年來，共黨專政，顯然並不好過沙皇時代，即使在若干方面有所進步，今日俄人也並未享受快樂和自由。由於過去史達林主義對內的死硬政策已走到窮途，共黨不得不有限度放寬自由尺度，但絕大多數人民至今仍未享到現代政制下應有的權利。

安德列·沙卡洛夫 (Andrei D. Sakharov) —— 本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蘇聯人權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在他的自述裏，慘痛的回憶了過去五十六年來，蘇聯經歷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駭、痛苦、屈辱，屠殺了數百萬最優秀的公民（在道德上以及在智慧上都是最優秀的），數十年的政治謊言與政治煽動，數十年內心與外表一致的趨炎附勢。現今，沙卡洛夫同意「那個恐怖時代」已經過去了①。

可是，精神上俄人仍舊生活在那個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氣氛裏。俄共仍然使用壓制的手段來對付那些不肯向它妥協的少數人。文藝界與科學界人士為此提出呼籲，並公然對當局政策表示抗議。

員會及核子試爆場。

沙卡洛夫於一九二二年出生於莫斯科，父親是個物理學教師，家裏算得上是個書香門第，生活相當美滿。一九三八年進入國立莫斯科大學攻讀；一九四二年畢業後，沙卡洛夫進入一家戰時工廠擔任工程師。此時正是艱苦的戰爭時期，他在這家工廠工作前後約有四年，除了發明幾種控制品質的新方法外，並無深湛的研究成果。

一九四五年是沙卡洛夫個人事業可資記錄的一年；是年他在蘇聯名理論物理學家譚姆 (Igor Evgenovich Tamm) 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夏，沙卡洛夫便被納入一個專門探討熱核武器的研究小組裏工作。由於沙卡洛夫個人的卓越成就，在是項領域裏，創獲了許多關鍵性的觀念，因而被西方尊稱為蘇聯的「氫彈之父」。此項稱呼，沙卡洛夫本人認為並不貼切。但毫無疑問沙卡洛夫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是既精且專，因此，他生活的

雖然沙卡洛夫生活的圈子是狹隘的，但在生活上却享受極渥惠的待遇。

這是不足驚奇的，任何共黨政權，不管它對於知識界如何迫害，對傑出的尤其有關軍事方面的科技人才總會給予優遇，因為共黨要利用他們的研究成果來征服世界。沙卡洛夫並不以他所獲的優遇為滿足，他卻於自己獲致相當成就時，作了極縝密的觀察與反省。在他所從事的核子試爆的研究工作中，他觀察到數千人的體力和心力匯集在一起，創造着足以毀滅一切人類文明的工具；漸漸他意識到，掌握着權力控制桿的人雖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天分，不過都是性善猜疑而且缺乏誠意者。

二

一九五七年，沙卡洛夫在人權問題上有極深遠的思慮；他不僅對和平與人類的問題作了澈底的反省，同時特別去思索核子戰爭及其貽禍後果的問

，他會有這種感覺，多少是受到史懷哲·鮑林（Linus Pauling）等人寫的關於這方面的文章的影響。有關大氣層核爆所造成的輻射落塵，嚴重地威脅人類的健康，特別是人類下一代的健全。據科學得知，輻射落塵能够破壞人體內專司遺傳功能的DNA分子，因而危害了胎兒的健康。

沙卡洛夫愈是思索，愈瞭解問題的嚴重性。迫使他在一九五八和一九六一年，兩次寫信給黑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極力闡釋大氣層核爆對人類的危害；以及這一連串的試爆，將會破壞禁試及裁軍的談判。而將導致新的軍備競賽——尤其在洲際飛彈及反飛彈防禦系統方面。可是沙卡洛夫的警告，却遭到黑魯雪夫的漠視與指斥。

黑魯雪夫說：「沙卡洛夫是一個優秀的科學家。不過，外交政策，這個詭詐的玩意兒還是讓我們這些專家來搞。只有靠武力才能使敵人改變態度的。我們不能明講我們以武力做後盾來執行這個政策，不過我們必須這樣做。如果我聽了沙卡洛夫這種人的話，那麼我就是傻瓜而不是蘇聯總理了。」②沙卡洛夫反對在大氣層核爆的主張，一時雖遭挫折，却不能動搖他對此問題的堅定立場。一九六二年俄共當局揚言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大氣層核爆；沙卡洛夫認為從技術的觀點言，這次的試爆是不必要的。沙卡洛夫認為是項計劃含有「罪惡本質」，因而竭力企圖制止它。甚至於在緊要時刻親自打電話給黑魯雪夫，請求他干預此事。可是最後他失敗了，他回憶試爆的當日情景說：

「那天我深深地體認到了無能與駭懼。這種感覺深深地烙在我的腦海中，永遠無法抹去。我的思想也從此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終於演變成我現在的態度。」③

三

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贈予沙卡洛夫，是不是沙卡洛夫對增進當前的國際和平有功呢？一點也不。他之所以膺選諾貝爾和平獎，主要表示承認、贊許他在人權戰場上的地位；特別是在蘇聯為反抗克宮當局濫捕政治犯、侵犯人權的正義立場的褒揚。諾貝爾委員會的理由是：「他向世界宣示和平、正義的訊息」；「他有個基本的原則，除非個人人權在社會中受到尊重，不然世界和平不能有永恆的價值」；「他絕不妥協而有力的抵抗權力濫用及各種

沙卡洛夫與蘇聯人權運動

形式的人權破壞，同時，又致力於尋求一個以人人平等為原則的理想國家。諾貝爾和平獎從一九〇一年以來，已頒發了五十五次，顯然它並不是每一年度都頒發，理由是使獎金的利息，累增到合理的數目。現在諾貝爾獎金是一萬四千鎊。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諾貝爾委員會頒贈沙卡洛夫的理由是實至名歸。一九六六年，他聯合二十五位蘇聯知名的科學家和文學家，共同署名寫了一封信給蘇共第二十三屆黨代表大會，在他們的信中，提出以下幾點：黑魯雪夫對史達林的譴責，不應該作任何修正，對史達林所犯的罪行，不應該作任何辯護。他們更提出警告：如果史達林主義復活，不僅會引發世界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分裂，並將造成世界極大的災禍。此項警告，明顯的是針對布里茲涅夫的政策而發的。

一九六八年，他發表「進步、和平共存與知識自由思索」宣言，文長約一萬字。這宣言所論及的範圍極廣，舉凡戰爭與和平、極權政治、學術思想的自由、人口問題與環境污染以及科學及工業進步的重要性等等。他自認為宣言中最突出而珍貴的論點，是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之間的「交融」，他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合力邁向民主化、非軍事化並且致力於社會、科技的進步，這是唯一能使人類免於毀滅的途徑」。他這篇宣言的蘊意也深受撰寫時的時局之影響——喧騰一時的「布拉格之春」。

在該宣言中，他分析了世界兩個超級強國愈益增長的相似性，以及提出美蘇達成全面和解四個階段的計劃。第一個階段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由思想鬥爭和辯論之後，進而放棄世界革命，和肯定世界和平共存，以及加強民主和改革經濟的必要。第二個階段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受到社會主義國家成就的刺激，進而採取與社會主義國家謀求和平共存、合作和交流的政策。第三個階段是：蘇聯和美國克服他們的對立狀態之後，進而共同解決世界貧乏地區的問題。第四個階段是：整個世界減少社會結構的歧異，共同從事於發展心知自由，科學和經濟進步，最後創立世界政府 and 消除國家民族之間的衝突④。

四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沙卡洛夫聯合另兩位物理學家查利則(Valery Chailize)及特維多克列波夫(Andrei Tverdokhlebov)創立了半地下性的「人權委員會」。此會的宗旨是「向蘇聯社會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及「維護蘇聯法律有關個人自由的實施」。其他參加此「人權委員會」的著名人權運動者有伏爾平(Alexander Y. Volpin)，以及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這個委員會的活動不僅在國外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在蘇聯境內更遭到「格別烏」的特別監視。

這個時期，沙卡洛夫對全球性問題的注意力開始轉移到維護個人的權利。幾乎像所有蘇聯的知識份子一樣，沙卡洛夫猛烈攻擊作家辛雅夫斯基(Andrei Sinavsky)和丹尼爾(Yuli Daniel)的非法受審。認為這是違背蘇聯憲法有關自由權的規定的。蘇聯現行憲法，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通過的。

讓我們檢視蘇聯憲法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及義務」中之第一二五條條文：「為適合勞動者利益並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計，蘇聯的公民，由法律賦予以如次各項自由：(一)言論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會自由；(四)街頭行進及示威自由。公民這些權利的保證為：印刷所，紙張，公共建築物，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為實現此種權利所必要之物質條件，均供勞動者及其團體享用。」⑤

可是這僅是有名無實的「紙上」憲法而已；蘇聯當局很少有實行它的誠意。所以從理論上說，蘇聯憲章中的人權，應當是最圓滿的人權；但從政治上說，蘇聯雖然有憲法，有憲法上的人權，而實際還是一個野蠻國家。問題出在甚麼地方呢？

最基本的問題，乃在於共黨的領導者，於真理的化身自居，不論經過任何手續所通過的法律條文，都不足以影響這種人的偉大意志。在共黨統治之下黨是騎在國家的頭上，黨章是騎在憲法的頭上，領袖又是騎在黨章的頭上，根本不承認憲法的地位，根本不承認法律的意義，從什麼地方可以讓人權的觀念出現呢？這才是人類所面對的共黨的問題，也是共產黨自己所面對的「化為反對物」的辯證法的問題。

沙卡洛夫針對克宮當局無視憲章的尊嚴，及抗議他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五日送交俄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備忘錄的被漠視，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廿

二日公開建議實行一項人權法案，並要求大事改變蘇聯的經濟與外交政策。沙卡洛夫強調他的方案的最高目標，是在於保護蘇聯人民的人權。

他說：「我們的社會中充滿了冷漠、虛偽、偏狹的觀念，自我主義和殘酷。本人深感憂慮驚恐，不得不指出：在屬於幻想的自由主義之後，人民思想自由所受的限制日增，也就是人民因政府和思想原因而受的迫害日增。」⑥沙卡洛夫的方案中，有着不少具體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一)大赦政治犯，包括因宗教原因、因企圖逃離蘇聯、及因逃避勞役而被判刑的人。(二)停止秘密審判，重新檢討非法判決的案件。(三)對政治犯判刑所依據的法律加以澄清，並訂立新的法律。(四)停止干擾外國無線電廣播。(五)人民自由閱讀外國文學。(六)為國際旅行移民開放邊界。(七)考慮廢除死刑。(八)加強禁止酗酒。

沙卡洛夫痛責政府、共黨與文化方面重要人員所享有的「公開或秘密的特權」，並控訴這些人對破壞人權毫不關心。他要求把共黨官員們的高待遇薪金數目加以公開。顯然沙卡洛夫並非為他自己或他的同僚們而呼籲，他是代表俄共統治下的廣大人民發言，不滿於現行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而要求較現行政策為更大幅度的改變和革新。

此時，沙卡洛夫本人及其家人，均陷入惡劣的政治環境壓力下，他形容「我們經常接到匿名電話，對我們威嚇嘲罵無所不至」。

沙卡洛夫身在蘇聯國內，居然胆敢提出這樣的控訴，這樣偉大的道德上的勇氣，真是令人不勝欽佩之至，不勝景仰之至。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真正關心國家的前途，關心同胞的幸福的人。我們常常批評蘇聯政府的所作所為，但深信俄羅斯人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偉人。

五

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沙卡洛夫對西方記者宣稱，在蘇聯國內未真正民主化之前，西方不應與克宮謀求「虛構的和解」(illusory détente)。他相信西方尤其是美國與蘇聯統治階級搞和解，只會加強蘇聯的獨裁政體，使蘇聯民主化、自由化的希望更加渺茫。他的這番言論，不僅觸怒了克宮權力核心，下令蘇聯傳播工具圍剿他，指為「國家的敵人」；同時亦使季辛吉難堪，後者聲稱：美國外交政策，旨在緩和緊張，不在改變蘇聯制度。不意此等解釋又激怒了索忍尼辛，他寫了三千字的文章，投寄挪威雜誌，提名沙卡

洛夫為和平獎金候選人⑦。

今年七月，沙卡洛夫又完成了一篇兩萬字的著作，題為「我國與世界」，此書即將在美國出版。沙卡洛夫在序文裏指出：「我國與世界」一文，乃是一九六八年所發表「進步、和平共存與知識自由的思索」這篇聲明的重寫。有關這本書的寫作，沙卡洛夫指出大體是一項討論所得的結果：去年十一月，他曾和美國保守派參議員詹姆斯·柏克來（James Buckley）在莫斯科寓所就和解問題進行討論。

沙卡洛夫在文章一開始就控訴蘇聯的內政與外交措施。他譴責一般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指責蘇聯無產階級的「流浪生活」（酒的消耗量是帝俄時代的兩倍）。他也指責蘇聯政府支持利比亞和烏干達的獨裁政治，並以種族大屠殺來壓抑伊拉克境內的庫爾茲（Kurds）族。

沙卡洛夫在「我國與世界」一文裏提出十二個重點以改善蘇聯的制度。其中舉犖大者有：建立多黨制度，全面的赦免政治犯與宗教犯，使工人罷工合法化，開放國境等。

他認為當前的蘇聯社會，係基於「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獨裁的一黨政府高踞在經濟、文化、主義和生活的其他層面上。這種一黨專政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在危急之時，是一種恐怖的紀律；在平靜之時，則產生混亂無能的官僚政治，而且在經濟上必須維持經常的軍事費用。如此，不僅加重蘇聯人民的負擔，而且也製造世界動亂的危機。但是，如要改變這種軍事化經濟體系，先決條件必須是徹底的政治革新⑧。

六

今年十月七日蘇聯科學院成立二五〇週年，克宮舉行大會，沙卡洛夫以院士資格出席，坐在第七排聆聽布里茲涅夫演說。布曾向院士們保證說：「我們不想要命令你們」。布曾這句話可說是欲蓋彌彰。布曾亦要求諸科學家為共產主義奮鬥，並聲稱克宮領導階層願與諸科學家共享一些權力，講詞有意無意指向沙卡洛夫。兩天後（九日）奧斯陸宣佈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金頒給沙卡洛夫。蘇聯塔斯社以政治評論員科尼洛夫（Yuri Kornilov）為名，發表專文指斥沙氏「鼓動資產階級領袖們從蘇聯尋求政治讓步，好反對國際經濟連繫的擴張，以及國際緊張情勢的緩和」。並稱該和平獎為「反蘇獎」⑨。

沙卡洛夫與蘇聯人權運動

沙卡洛夫認為他這次獲獎，將有助於在蘇聯境內的政治犯改善待遇；並對那些為爭人權而付出個人自由者，確為一大表彰。沙氏也對西方記者表示，他已決定參加十二月十日在挪威首府奧斯陸舉行的頒獎典禮。但他担心克宮恐不准他出境，或僅許可他出境却拒發再入境許可證（這是每一個從事旅行的蘇聯人所必備的）。

沙氏的憂慮不幸而言中，十一月十二日蘇聯政府峻拒了沙氏的申請出境；理由是他「保有國家機密」。沙卡洛夫說，他已向負責官員提出抗議，他認為克宮當局不准他前往「是侵犯了我，也侵犯了諾貝爾獎委員會」。

沙氏被阻出境的消息傳出後，引起全世界輿論，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憤慨。主辦諾貝爾獎的有關當局對此自極表遺憾，並聲稱「儘管蘇聯拒絕給沙卡洛夫簽證，頒獎儀式將照常舉行」。美加兩國三十二位過去曾獲諾貝爾獎的得主，特聯名向克宮呼籲應准許沙卡洛夫出境領獎。

事實上克宮的最後決定，的確是左右為難。無論讓沙氏出境與否，最後的結果總是對克宮統治階層不利。為了避免讓沙氏出國而被西方拿來宣傳，並捧為名士；以及避免在海外再製造第二個「索忍尼辛」，無時不攻擊克宮內外政策起見，乾脆禁他在國內，並授意各種喉舌予以圍剿較為妥當。

克宮領導階層的算盤是打錯了。此舉不僅更加激勵蘇聯知識階層與沙氏團結一致，為爭取自由、保衛人權，甚至不惜以生命與蘇共當權者相搏鬥；同時，克宮對沙案的處理，已自揭穿了它對「和解」的陰謀。美國參議員賈克遜（Henry Jackson）指出，沙案顯示最近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會議，美國是受了蘇聯的欺騙。這一指出令人聯想到在沙氏獲獎的前兩個多月，布曾和其他三十四國的領袖們，在赫爾辛基簽署的「最後議定書」裏的一句：「對有關人道的問題，給予富於同情的注意」——這也就是沙卡洛夫所奮鬥爭取的主要目標。

（註）①張伯權、王鴻仁合譯，「沙卡洛夫自述——我為什麼成爲一個蘇聯叛徒」，聯合報，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十九日。②同前註。③同前註。④Time (U.S.) Aug. 2, 1968, pp. 24-26. ⑤復復觀，「蘇聯的人權問題」，華僑日報，民國六十一年六月廿九日。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8, 1972. ⑦Ibid. Sep. 12, 1973. ⑧Time (U.S.) Aug. 4, 1975. ⑨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11-12, 1975.